

有关刘伯温的诗词考述二则*

吴 留 营

内容摘要:清康熙间徐鉉《词苑丛谈》“纪事”卷中收录的《沁园春》词冠以“刘文成伯温”之名(即指刘基),而考察《词苑丛谈》成书缘起,可知这一说法不足为信。余阙以舍身护国之忠义而受元、明两朝褒奖,刘基若为其写词歌颂,没有在《写情集》中隐匿该词的理由。考该词在明时姜南《蓉塘诗话》中已存在,作者极有可能即是姜氏本人。刘基与余阙二人既非同乡,又未同馆。余阙所作《送刘伯温之江西廉使得云字》之送别诗亦非赠与刘基,而是赠与沙刺班。

关键词:刘伯温 刘基 姜南 《蓉塘诗话》 余阙 沙刺班

与刘基^①(字伯温)的政治作为相比,其在文学特别是诗词方面的成就并未获得学界的足够重视,刘基词集《写情集》也尚未有笺注本问世。可喜的是,近些年关于刘伯温诗词的研究论文不断涌现,研究角度不断拓展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。笔者对两首涉及刘伯温的诗词进行探究,希望厘清基本的文献事实。

刘伯温著述甚丰,作品涉及经学、文学、天文、军事等诸多门类,至今流传六百余年,不免有所散佚;因其功高名重,作品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出现托名附会之作。因此,对刘伯温作品的研究要求全、求真、求是,辑佚和辨伪并行。

刘伯温的词集《写情集》初刊于洪武十三年(1380),永嘉儒学训导叶蕃在集前序文中写道:“先生……著书立言,以俟知者。其经济之大,则垂诸《郁离子》;其诗文之盛,则播为《覆瓿集》;风流文采英馥,阳春白雪雅调,则发泄于长

*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“东亚汉诗史初稿”(14AZW007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刘基(1311-1375),字伯温,处州青田县(今浙江文成县)人,封诚意伯,谥号“文成”。为行文方便,下文提到刘基之处,一般用其字“伯温”。除非特别说明,刘伯温即指刘基。

短句也。”^①叶蕃的序言,提纲挈领地概述刘伯温其人、其文,对《写情集》的创作缘由、风格特色和思想感情都作了精妙的论说。这对准确把握刘伯温作品的内涵特质有着重要的意义,也使辑佚和辨伪工作有所依傍。

《写情集》自洪武本始,历经成化本、正德本、嘉靖本、隆庆本、雍正本、乾隆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光绪本,以至今林家骊点校本,或曰诗馀,或名《写情集》,作品次序有所变化,但篇目并无增益。然在清康熙间,徐钊《词苑丛谈》中载录的一首《沁园春》,谓其属刘伯温之作:

宋文丞相过唐忠臣张巡、许远双庙,留题《沁园春》一阙,词旨壮烈,千载后昭然与日月争光。明刘文成伯温过安庆,亦作《沁园春》词,哀余忠宣公阙,正与文山之词相匹。词云:

士生天地间,人孰不死,死节为难。羨英伟奇才,世居淮甸,少年登第,拜命金銮。面折奸贪,指挥风雨,人道先生铁肺肝。平生事,扶危济困,拯溺摧顽。清名要继文山。使廉懦闻风胆亦寒。想孤城血战,人皆效死,阖门抗节,谁不辛酸?宝剑埋光,星芒失色,露湿旌旗也不干。如公者,黄金难铸,白壁谁完?^②

今有论者已在文章中直接引该词为刘伯温之作,亦有人断言此为刘伯温所作无疑^③。事实上,这首收录在《词苑丛谈》“纪事”卷中的轶词,徐钊并未注明其出处。徐氏在自序中说:“从退食之暇,与同年好友秀水竹垞朱君、宜兴其年陈君互相参订,竹垞始谓余摭摭书目,必须旁注于下,方不似世儒剿取前人之说以为己出者。”由此可见,该书写就之后,徐钊曾邀好友朱彝尊、陈维崧参校。三人同为康熙己未词科征录之“博学鸿儒”,朱、陈二人乃词坛巨匠,分别为浙西词派、阳羡词派领袖。朱彝尊一针见血地指出,书中征引的内容,须标明出处。徐钊以之为然,但事实上并没有做到,或者说做得很不到位。他给出的理由是“惜已脱稿,无从一一追溯,间取偶及记忆者分注十之二三”。由此观之,即使已注明出处的,亦是追忆补记,有待确证。

而对《词苑丛谈》的编写缘起,也应审慎考察。观其自序曰:“徐子之为《词苑丛谈》者,从无聊羁旅中,搜取乐章,可佐樽前酒边之所吐属者,拾残纸秃笔,随时随地书之。”该书《凡例》中,徐氏言“纪事”:“余惟搜采逸事可传佳话者,庶足供麈尾闻谈。”此“纪事”在于为词作传,而非“纪实”。尤侗在《词苑丛谈序》中亦称:“年友徐子虹亭,词人之翹楚也,向曾续孟棻之《本事诗》,予为作序。今复辑成《词苑丛谈》一书,盖撮前人之要而搜新剔异,更有闻所未闻者,洵倚声之董狐矣。”不难看出,《词苑丛谈》类于笔记小说,为充谈资而求新求异,难免生发附会之文。

此外,该书并非徐钊一人之力而成。徐序中提到:“偶与周子雪客追话昔

①叶蕃:《写情集序》,刘基著、林家骊点校:《刘伯温集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1年,第839页。

②徐钊:《词苑丛谈》卷八,康熙二十七年刻本。

③吕立汉:《榛芜原野的一朵奇葩——论刘基词》,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》2000年第2期,第45-49页。

年,同游燕市……因及《丛谈》,则周子亦方有事于斯,亟索其稿,视予补缀犹十之四五,予因请而荟萃毕业焉。周子勿靳,悉以畀予。”基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,徐鉉都无法将书中的典事一一注明出处,有些典事成为不解之谜。

这首《沁园春·生天地间》被徐鉉冠以刘伯温之名,康熙间王弈清奉敕纂辑《历代诗馀》亦沿袭这一说法。嘉庆间,冯金伯惜《词苑丛谈》不甚周密,便删去十分之一,增入十之三四,遂成《词苑萃编》,而这首《沁园春》词不在删除之列。1980年唐圭璋校注《词苑丛谈》,增补书中所有条目的出处,该词被追溯于“文成本集”^①,而考诸明清以来刘伯温集(词集)的各种版本,均未得见。成书于2003年的《全明词》未录该词,四年之后出版的《全明词补编》收录该词,作为唯一补入的刘基词,留下存疑的按语,其所依据则为《词苑丛谈》。

二

需要指出的是,该词不见于刘伯温集明清各本,但也并非突现于康熙朝。明人姜南《蓉塘诗话》已将该词列于刘伯温名下,其卷三《吊余忠宣公词》载:

宋文信公尝过唐忠臣张公巡、许公远双庙,留题《沁园春》词一阕,道二公之精忠劲节。辞旨壮烈,千载之后,昭然与日月争光。本朝刘文成公伯温过安庆,亦作《沁园春》词,哀余忠宣公阙,正与文山之词相匹。录之词云:

士生天地间,人孰不死,死节为难。羨英伟奇才,世居淮甸,少年登第,拜命金銮。面折奸贪,指挥风雨,人道先生铁肺肝。平生事,扶危济困,拯溺摧顽。清名要继文山。使廉懦闻风胆亦寒。想孤城血战,人皆效死,阖门抗节,谁不辛酸?宝剑埋光,星芒失色,露湿旌旗也不干。如公者,黄金难铸,白璧谁完?^②

与前引徐鉉《词苑丛谈》所录相校,引文中除有同义词转述外,基本一致。可知徐氏录自姜南《蓉塘诗话》无疑。姜南,字明叔,号蓉塘,仁和(今属杭州)人。其生卒年失考,《明词话全编》、《全明诗话》等书皆言其“行迹不详”^③、“生平未详”^④。据松江(今属上海)陆深嘉靖癸卯(1543)年为该书所作的引文,姜氏曾在此际拜会陆深,知其大略活动于正德、嘉靖间。该诗话虽有嘉靖张国镇刻本、洪楸刻本,但其流播却显繁乱,以至于它的接受状况远不及后世之《词苑丛谈》诸书。该书原作二十卷,四百馀则;有明钮氏世学楼抄本,删节仅录六十馀则;至明末清初陶珽汇编《说郭续》则仅为一卷。而因其收录驳杂,又常被说部辑入,《八千卷楼书目》即将其置于小说家类^⑤。傅增湘《藏园群书题记》言

①徐鉉撰,唐圭璋校注:《词苑丛谈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,第170页。

②姜南:《蓉塘诗话》卷三,影印嘉靖二十二年张国镇刻本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695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638页。

③邓子勉:《明词话全编》,凤凰出版社,2012年,第490页。

④周维德:《蓉塘诗话提要》,《全明诗话》,齐鲁书社,2005年,第27页。

⑤丁立中:《八千卷楼书目》卷十四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09年,第221页。

“此书虽名‘诗话’……实说部也”，指出“此编流播较稀”^①。不惟如此，该书作者亦曾湮没无闻，《中国历代诗话选》在著录此书时，作者一栏题为“不著撰人”^②。何以至此？莆阳（今福建莆田）张秉壶（字国镇）在嘉靖刊本跋文中称：“蓉塘先生谒宫端公于云间，偶出诗话见示，坐客竞羨之，传借不已。”或即该书在传抄过程中，既有篇目的取舍，甚至撰者的遗漏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《蓉塘诗话》内容的可信度不高。与该书版本流传之错乱相对应的，是其内容也引起学者的质疑和反驳。清初朱彝尊辑录《明诗综》，汪森等人辑评，在揭轨（字孟同）诗《宴南市楼》后的评语中，针对姜南《宴饮用女乐》所述失实之处，不惜笔墨，详加考实，进行发难^③。除此之外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对该书颇有微词，指责其收录之荒诞不经：

小说载书生见苏轼侍姬朝云之魂者，得集句七言律诗十首、七言绝句十五首，今乃在此集第八卷末。盖黄游戏之笔，即《黄佐传》中所称《集古律诗》一卷是也。黎贞乃缀于集后，又并载其序。遂似黄真有遇鬼事者，殆与林鸿集末附载张红桥诗同一无识。姜南《蓉塘诗话》又从而盛称之，更无当矣。^④孙蕢《西庵集》有《朝云诗（并序）》，借梦笔书写苏东坡与王朝云的才鬼故事，提要以“无识”评之；姜南则在其诗话中予以激赏，提要并斥其“无当”。陆深在书前引文中称诗话“不但论诗而已，下至俚俗歌谣、星历医卜，无所不录。至其甚者，虽嘲谑鬼怪、淫秽鄙亵之事皆有”^⑤。与《吊余忠宣公词》同样收录在《蓉塘诗话》卷三中的“黑猪变白”之类，显然不足征信。《续四库提要三种》亦称是书“喜标多目，几近讖仄，为明人小品积习”^⑥。

今有论者称，姜氏《蓉塘诗话》“有些文献材料的辑录，足补正传之缺失，校正今本之脱误”^⑦。此说固有所指。大略而言，姜氏所辑录，或为浙地故实，或为明季时事，较多条目都注明了来源出处，可考且可资借鉴。但是正因如此，反衬出姜氏所记刘伯温《吊余忠宣公词》既未溯及本源，又未言及作年，与书中同类条目颇为殊异。

三

事实上，现今若要断定该词为刘伯温所作，信姜氏所言为实，则需要回答诸多问题。譬如：该词缘何不见于明初刘伯温集，而乍现于嘉靖朝，近200年因何不传？而后各种刻本、抄本为何亦不收录？

①傅增湘：《蓉塘诗话跋》，《藏园群书题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230页。

②王大鹏等：《中国历代诗话选》，岳麓书社，1985年，第993页。

③朱彝尊：《明诗综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289-291页。

④永瑆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九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1474页。

⑤陆深：《蓉塘诗话引》，《蓉塘诗话》卷首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695册，第625页。

⑥胡玉缙：《续四库提要三种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01页。

⑦周维德：《蓉塘诗话提要》，《全明诗话》，第27页。

有论者言该词为称颂前朝旧臣余阙，因而不便收录集内^①。诚然，明太祖时期，大臣因文字或言论获罪者屡见不鲜。“明祖惩元季纵弛，特用重典驭下，稍有触犯，刀锯随之，时京官每旦入朝，必与妻子诀，及暮无事则相庆，以为又活一日。法令如此，故人皆重足而立，不敢纵肆。”^②事君者自是深谙人主脾性，惶惶不敢多言。被太祖誉为“吾之子房”的刘伯温，晚年曾有“探珠入龙堂，生死在一瞬”^③的诗句。

即如宋濂作品集《文宪集》只收录入明以后的作品，而大量元时所作诗文见弃集外，此乃其为防不测而做的取舍。刘基诗文集是否亦同此类？笔者认为不能轻易论断。刘基虽有意将明前诗歌和明时诗歌分列成册，但未曾刻意隐匿元时作品。翻阅《诚意伯文集》，明前诗文大量存在，甚至与石抹宜孙等前元旧将（石末氏与明军在处州交战，死之）的酬唱诗词亦存于集中，并未隐匿。尤须指出的是，余阙并非一般的前朝旧臣，其以忠义赴死之举而受两朝褒奖，实不多见。《元史》记载，余阙殉国之后，元廷对其大加封赏，连他的对手陈友谅也感其忠义而厚葬之；朱元璋攻下安庆后，又立庙祭祀^④。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六载：“上敕礼官曰：‘自古忠臣义士舍生取义，身歿而名存，有以垂训于天下后世，若元右丞余阙守安庆，屹然当南北之冲，援绝力穷，举家皆死，节义凜然……自昔忠臣义士必见褒崇于后代，盖以励风教也。宜令有司建祠肖像，岁时祀之。’”^⑤事实上，余阙据守安庆正好阻挡了陈友谅的兵锋，牵制了陈汉的大量兵力，使朱元璋得以养精蓄锐，在此后的鄱阳湖大战中一举制胜，歼灭汉军，进而统一江南。

因此说，不管是主观上褒奖忠义的统治需要，还是曾经有过客观上的“协同作战”，朱元璋对余阙这位前朝的将领非但没有敌意，相反一直比较推崇。明初严苛的文治政策，是会让跨代文人自觉与前朝旧臣划清界限，但之于余阙却没有这种必要。宋濂本与戴良交往甚密，但入明后戴良不愿事从新朝，忤逆太祖，下狱而死。因此宋濂为自己编定的文集中找不到二人相交的任何言语。为人和行文都很谨慎的宋濂，尚且专门为余阙写过《余左丞传》，赞其气节，他所主编的《元史》余阙本传褒扬的笔法更不待言。刘伯温若为余阙填词颂功，不但不为朝廷所忌，反而契合统治者以忠义牢笼天下的策略。因此，没有藏匿此类诗文的必要。

四

有论者试图从刘伯温与余阙的交游来佐证《沁园春·生天地间》之归属。典型的当属余阙所写的《送刘伯温之江西廉使得云字》：

①桑军：《刘基词研究》，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，第34页。

②赵翼撰，曹光甫校点：《廿二史札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668页。

③刘基：《旅兴》，《刘伯温集》，第472页。

④宋濂等撰：《元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年，第3429页。

⑤夏元吉等：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六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385页。

祖帐依仙馆,车盖何缤纷!使君驱驷马,衣上绣成文。中坐陈绮席,羽觞流薄薰。情多酒行急,意促歌吹殷。况我同乡友,同馆复同群。初暘丽神皋,遥望澄远氛。回镳望双阙,五色若卿云。苍茫岁年徂,东西岐路分。道长会日远,何以奉殷勤?惟有凌霜柏,天寒可赠君。^①

从光绪朝《青田县志》^②到王馨一所撰《元刘伯温先生基年谱》^③、郝兆矩《增订刘伯温年谱》^④均认为此为余阙送刘基诗,所受误导者众。事实上,这首赠给“刘伯温”的送别诗,余阙并非是写给青田之刘伯温的。刘基在江西的履历是清楚的,举进士授江西瑞州路高安县丞,顺帝至元二年(1336)赴任,并非赴任“廉使”之职。后辟为行省职官掾史,均非“廉使”。史传多载刘基在江西为官“有廉直声”、“以廉节著”^⑤,那么是否可称“廉使”?其实不然。廉使是元代职官名,全称肃政廉访使,掌监察事务。据元制,“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,廉访使二员,副使二员,僉事四员,经历、知事、照磨兼管勾各一员。置司龙兴路,至元十四年置”^⑥。又据《[万历]南昌府志》载:“至正四年十有二月,太中大夫、(江西湖东道)肃政廉访使张掖刘公沙刺班上任之日,谒先圣先师于大成殿,礼也。”^⑦故而余阙诗中的“刘伯温”另有其人,即唐兀人沙刺班,汉姓刘。虞集《道园类稿》中《江西监宪刘公去思碑》载:“公名沙刺班,字伯温,世家宿卫旧臣,有家学。历西北山川形要,验以前史如指掌,学于成均,知内圣外王之道。观史传,得古今之变,如亲履之。拜御史,佐行省,明见卓识,出于学问。修《金史》于著廷,尽得其为国之终始,使后世可以鉴其治乱也。”^⑧这位来自河西张掖(西夏故地)的唐兀人刘伯温,与祖籍河西武威(同为西夏故地)的余阙才称得上是“同乡友”。而余阙与“世为处州青田人”的刘基无从论起“同乡”。《增订刘伯温年谱》称“阙曾‘出僉浙东道廉访司事’,是诗或为阙任职浙东时所作,故与基有‘乡邦友’之称”,认为诗题是“余阙廉访使诗《送刘伯温之江西》之误”^⑨,该说法以讹解讹,实误。

元代长期因义例难定而无法撰修前朝史书。元顺帝至正三年(1343),才决定“各与正统”,辽、宋、金三史分别撰修。此间,余阙被召入翰林为修撰,与危素负责《宋史》列传部分。“至正三年,沙刺班拜秘书卿,修《金史》。”^⑩这样,

①余阙:《青阳集》卷一,上海涵芬楼景印明刊本。

②考光绪朝以前的《青田县志》,并未录入该诗。

③王馨一:《元刘伯温先生基年谱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0年,第19页。

④郝兆矩:《增订刘伯温年谱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0年,第28页。

⑤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卷一二八,中华书局,2000年,第2505页。徐开任:《明名臣言行录》卷三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520册,第442页。

⑥柯劭忞:《新元史》,《元史二种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291页。

⑦《[万历]新修南昌府志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0年,第542页。

⑧虞集著,王颀点校:《虞集全集》,天津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1041页。

⑨郝兆矩:《增订刘伯温年谱》,第29页。

⑩虞集著,王颀点校:《虞集全集》,第1089页。

才有了余阙诗中的“同馆”之谊。至正四年十一月,《金史》修成,右丞相、领三史事阿鲁图奉表进呈御览,言及“臣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沙刺班……为史官,集众技以责成书,伫奏篇以览近监”^①,亦可资佐证。而考察刘基履历,至正三年、四年间在家“隐居力学”,没有与余阙同馆的机会。

因此说,这首送别诗,是余阙送给同乡好友沙刺班的,而非送与后来的诚意伯刘伯温。这也提醒我们,文学研究中对于少数民族文人要给予充分的认识。特别是在元代,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是空前的,蒙古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占据统治地位或具有较高社会地位,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文人的成就和地位更是不容忽视。

五

作为忠义之士,余阙殉国之后,除了新旧朝廷均予褒奖之外,时论推重,吊谒缅怀者众多,留下的祭奠之诗文亦为可观。撰者既有王冕、袁枚、赵翼、蒋士铨、黄景仁等名流大家,又有名不见史传的同情之人、有识之士。与此同存的另一现象是,有明以降,作为开国元勋,刘伯温之名在民间一直有着传奇化的流布,托名刘伯温的著作不断涌现,数量甚至超过其原著。刘基去世140年后,正德九年,赐诰赠太师,追谥文成。正德十四年,重刻《诚意伯文集》。嘉靖七年,增印文集。嘉靖十八年,廷议刘基宜侑享太庙,九世孙刘瑜嗣伯爵,诏准。嘉靖三十五年,《诚意伯文集》得以再次重刻。从上述时间梳理中不难发现,刘基的政治作为被后世帝王重新认可,与此同时,其文学成就也再次获得文坛的广泛重视,并一再引发评议热潮。由是,该首托名之词在正德、嘉靖间出现,特别是出现在诗话杂著中,并不突兀。

回到姜氏所录这首《沁园春》词,初读起来,言辞壮烈,但仔细推敲,则问题不少。

(一)从缘起上看,该词如词前引文所述,文天祥过张巡、许远庙时留下《沁园春》词以凭吊述怀,而兹所录词“正与文山之词相匹”,可成一段佳话。事实上,姜氏录词之于文天祥词模仿痕迹非常明显,句法上尤甚,这反映了作者意欲“与文山之词相匹”的深切心理。而此,恰恰与刘基所作的凭吊诗文风格不类。

(二)从格式上看,该词双调一百十三字,显然非《沁园春》正格。《词谱》载,《沁园春》,双调,一百十四字。前段十三句,四平韵;后段十二句,五平韵。一韵到底。前半阙四五句,六七句,八九句,后半阙三四句,五六句,七八句常用对仗^②。对比来看,姜氏所载词首句五字,即已失调。上阙第十二句、下阙第十一句各少一字,与正体殊异。考陆游曾有一百十三字《沁园春》,又叫作《洞庭春色》,在下阙次句减一字,自成一体。而姜氏所录词与上述诸体皆不相同。

①脱脱等:《金史》附录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2901页。

②陈廷敬、王奕清:《钦定词谱》,影印康熙内府刻本,中国书店,2010年,第667页。

刘基《写情集》存《沁园春》词有二,与格皆合。从对仗要求来看,姜氏所录词亦显杂乱,而刘基《沁园春》二首对仗皆工。

(三)从内容上看,亦非刘基之笔。姜氏所录词上阕四五六七句叙写余阙家世生平,用一字豆“羨”来引领,其实已暴露作者身份。余阙以忠义之身殉国,流芳青史,时人或后人凭吊景仰者众。然作者所羨之处,除了其英名奇才外,还有年少登第、殿前受命。此虽余阙实事,但对于不同的凭吊者而言,显然会用词不同,对于刘基,恐不然也。考诸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,刘基与余阙乃同年进士,分别赐官。时年余阙三十一岁,刘基则只有二十六岁^①,所以羨“少年登第,拜命金銮”之说与刘基不符。而“先生”一词虽以景仰之意,人人可用,但更含晚辈追慕前贤之情。

此外,用词上亦有漏洞。下阕“使廉懦闻风胆亦寒”中“廉懦”实为误用,廉顽立懦,或顽廉懦立,典出《孟子·万章下》。若用,则当用“顽懦”。而“露湿旌旗也不干”一句更有凑韵之嫌,与刘基词难以相匹。

(四)从用意上看,这首词与其他凭吊余阙的诗词亦有所不同。历览元末以来诸家之作,多着眼于余阙生之忠义,死之壮烈。而姜氏所辑该词则用全录的笔法叙写了余阙生平,除前文述及的他作不曾着墨的“少年登第”,该词还提到了别词未言的“面折奸贪”一事,恐怕也与作词之时的社会腐败形势有关。词前引文中的“忠臣”、“精忠劲节”等称誉也昭示着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。姜氏《蓉塘诗话》中另有《捕虎诗》等亦如此,前无出处,托名而作,褒忠贬佞,颇值得注意。

六

综上,凭目前史料,断言《沁园春·生天地间》为刘伯温所作,有失慎重。而通过探究,更多的材料指向其并非刘伯温作品。其作者,更可能是生活在正德、嘉靖间的晚生后学,填词尚且不甚精通,但又深怀家国之志,常思历代治亡兴衰之得失,渴望朝廷亲贤远佞。通览《蓉塘诗话》,可知撰者姜南正是一位这样的人物。是书虽名诗话,但史政资料比比皆是,以古鉴今之意甚明。陆深在《引文》中赞及“诗话……发幽隐,昭鉴借,纪岁月,顾有裨于正传之缺失,盖史家流也……是集所录,经世之端盖多矣”;周维德评“此编以述事为主,但引述故事,往往附以己意。评述时事,伸张正义,多为警世名言。如对唐玄宗、宋徽宗好色爱石、误国害民的述评,足醒世人耳目”^②,此言得之。

当然,正德、嘉靖年间,权奸当道,政事日坏,其时如姜南之自醒且醒世者不一而足。若要判定该词即为姜南所作,亦须小心求证。如前所述,姜南于史无传,所著诗话亦流布错乱,诗文更少有可考。兹仅据目前所能检阅的材料,做一推论。嘉靖二十二年(1543),以詹事府詹事致仕、里居颐养天年的陆深为

^①王颢点校:《元统元年进士录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2年,第172、210页。

^②周维德:《〈蓉塘诗话〉提要》,《全明诗话》,第27页。

《蓉塘诗话》撰引文，文中称姜南为“吾友”、“可谓博雅之士哉”，言“予在京师时，尝一读之，卷帙尚多”，可见《蓉塘诗话》成书不晚于嘉靖十九年陆深归里；又言姜南“方工进士业，余力及此书”，考姜南于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中举，若自此即致力于进士科试，则诗话早在正德时即已着手编撰。正德年间帝昏权奸，政废国衰，姜南诗话中较多篇幅或借史为鉴，或托名以讽，实有所指。

此外，姜南在诗话中多次提及“吾师马鹤窗”^①，考鹤窗名马洪，杭州人，杨慎称其“善诗咏，而词作尤工”^②，徐伯龄评其“能大肆力于学问，既得诗律之正，复臻诗馥之妙”^③，《〔万历〕杭州府志》誉之“善为声诗，有长庆以还风致；其词调尤极妍丽，皓首韦布，而含珠吐玉，锦绣胸肠”^④。此外，《〔嘉靖〕仁和县志》还提到其“业儒不遂，乃居塾授徒，一时英才有志科第者悉求发轫”^⑤。由上不难得知，马洪“博学工调章，擅名东南”，姜南曾拜其门下求艺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姜南师从马洪是为科第，至于诗词创作，他未必充分留意。除了与其科考目的不符外，从时论亦可观之。《〔万历〕杭州府志》载姜南“博学多闻，坚强尚义，平生嗜书，至老不倦。虽为时宰，馆宾无所倚附”；嘉靖间姜南曾知延平府，该地《府志》亦仅以“博学多文，坚强尚义”^⑥八字评之，历代府志均未言及其诗词创作情况，相关艺文志中亦吝笔墨，丝毫不涉姜氏著作，与历任知府颇显殊异；其友人笔记和明清丛书、类书中也未见著录，粗知其诗词创作成就恐不高。

姜南与陆深交情匪浅，顺蔓追索，陆氏诗文中时常有姜南名字出现。在《玉堂漫笔》中，陆氏赞许姜南对艺林故实之熟稔。其时，屡有人误以为《七贤过关图》所画是竹林七贤，而姜南纠之，云是开元间冬雪后张说、张九龄、李白、王维、孟浩然等人出蓝田关游龙门寺之景，并举诗为证。嘉靖二十一年，陆氏与姜南等人在中秋夜共赏明月，留下《壬寅中秋夜同姜明叔王元宾玩月》一诗；二日后，又同登江上楼阁，陆氏再写《中秋后二夜与姜蓉塘诸友登楼》以记之。陆氏结交广泛，与人酬唱之作甚多，却无陆姜二人赠答往还之作，亦可佐证姜氏诗词创造力之不足。

另须指出的是，姜南参与编纂《古今说海》一事。姜南与陆深的交情延及其子陆楫，陆楫汇集云间、杭城诸才子辑古今野史外记、艺书怪录之流，勒成一书。据该书卷首之《校书名录》，姜南在十余名编校人员中居于首位。不可不提的巧合是，嘉靖二十二年、二十三年，《蓉塘诗话》与《古今说海》相继出版。而《古今说海》一书作伪之事，已广受后世学界诟病。鲁迅斥曰“贾人贾利，撮合雕镌，如《说海》，如《古今逸史》……为欲总目烂然，见者眩惑，往往妄制篇

①姜南：《蓉塘诗话》卷一七、卷一九，第39、51页。

②杨慎：《词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39页。

③徐伯龄：《蟬精集》卷一一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67册，第147页。

④《〔万历〕杭州府志》卷八四、卷五七，万历七年刊本。

⑤《〔嘉靖〕仁和县志》卷九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194册，齐鲁书社，1997年，第148页。

⑥《〔乾隆〕延平府志》卷二二，同治十二年重刊本。

目,改题撰人,晋唐稗传,黥剿几尽”^①。该书既是明代小说丛书的开山之作,又肇伪妄之端,触发“明人刻书时假托作者、妄制篇名的恶习”^②。身为该书的主要编纂者,姜南自然难脱干系。

据笔者钩沉,姜南所存诗有二,见于其所编《通玄观志》。嘉靖间,通玄观法师郁存方邀姜南纂志,姜氏不辞其请,汇编该志之时,在艺文卷中加入了自己所作的两首七言律诗:《云亭望鹤》、《星台夜谒》^③。此二诗借通玄观之景而作,在所录众人诗歌中不觉突出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二诗列于胡世宁二诗之后,与胡诗同题同意,模拟痕迹明显。与姜南为仁和同乡的胡世宁,历仕弘治、正德、嘉靖三朝,官至兵部尚书,加太子太保,卒谥端敏。胡世宁曾冒死揭发宁王之反,其为官之刚正廉洁,受知于朝廷,扬名于民间。同为乡党,姜南曾撰《胡氏家传》,且在诗话中赞及胡端敏公之处有四则之多;在《通玄观志》中又以己诗并于先贤,以期共传,这种做法在有明一代屡见不鲜。反观姜氏在诗话中录《沁园春》词,借以同文天祥《沁园春》共传之意亦不待言。

就“词”而言,如前所述,姜南本人并未深研词律。诗话中虽有多处品评词人词作,但止于片言,其考辨《温公词》一则,亦因袭徐伯龄之语,而非原创。另外,诗话中亦录有凌云翰《沁园春》词,格正律合。姜南所录《沁园春》若为刘基或他人作品,其不合之处,在抄录时当有所觉察^④。而该词最终能得以付梓,原因恐是姜氏自创该词而错不自知。

综而观之,该词既非出于刘伯温本集,又不见于姜氏之前人称引。尤为重要,该词从格式到内容上均有纰漏,再结合其托名讽喻的一贯风格,推测极有可能出自姜氏本人之手。姜南居于杭州,对于浙江特别是杭城故实有较大兴趣且较多辑入诗话。许远,杭州人;文天祥,曾知临安(杭州)府;余阙,曾僉浙东宪司,皆有舍身护国之实绩。此三人之忠肝义胆,正是正德、嘉靖间朝廷之所需、为臣者所应具。结合朝廷为浙人刘基正名、允其后裔嗣爵的动议,姜南在诗话中把许、文、余、刘诸位忠义之士衔接起来,既是对奸宦的不满和鞭挞,又是对忠臣的期待和呼唤;既是其本人政治理想的抒发,又期以两词合璧成诗话之经典。

【作者简介】吴留营,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明清文学。

①鲁迅:《唐宋传奇集·序例》,天津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页。

②李剑国:《伪书辩证》,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,1993年,第1159页。陈大康:《明代小说史》第三编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7年,第227页。

③姜南撰,吴陈琰增补:《通玄观志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246册,第425页。

④康熙间王奕清纂辑《历代诗馀》转引该词时,即删去起句的“士”字,订正了明显的讹误。